

# 成都考古研究



上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http://www.sciencep.com)

# 成都考古研究

(一)

上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考古研究论文集，收录论文 57 篇，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以来有代表性论文的一部分。时代从史前到历史时期，涉及地域主要是四川盆地，少数文章也涉及岷江、川西高原及云贵地区，其中大部分文章已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过，少数文章没有发表过。该文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历年所作过的考古工作与研究状况。

本书可供从事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学者，以及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参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都考古研究 /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3-023831-3

I. 成… II. 成… III. 文物—考古—四川省—文集 IV. K872.7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10876 号

责任编辑：宋小军 / 责任校对：李奕萱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9年1月第 一 版 开本：889×1194 1/16

200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46

印数：1—1 600 字数：1 310 000

定价：360.00 元（上、下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 目 录

## 上 册

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	江章华 王毅 张擎	(1)
安宁河流域考古学文化试析	江章华	(23)
大渡河中游先秦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及相关问题	陈剑	(35)
四川盆地晚更新世石器工业的初步观察	何锟宇	(53)
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	江章华 王毅 张擎	(63)
宝墩村文化的初步认识	王毅 孙华	(88)
四川温江县鱼凫村遗址分析	蒋成 李明斌	(106)
峡江地区龙山时代遗存初步研究	李明斌	(128)
再论川东长江沿岸的史前文化	江章华	(137)
波西、营盘山及沙乌都——浅析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演变的阶段性	陈剑	(146)
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存新发现的几点思考	江章华	(159)
大渡河上游史前文化、环境与生业初析	陈剑 何锟宇	(167)
川西彩陶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陈剑	(181)
浅议澜沧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	周志清	(197)
浅析安宁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类型	周志清	(214)
三星堆文化研究	王毅 张擎	(224)
三星堆系青铜容器产地问题	江章华	(237)
羊子山土台再考	李明斌	(246)
彭县竹瓦街青铜器窖藏考辨	李明斌	(256)
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发掘与意义	朱章义 张擎 王方	(263)
金沙遗址出土青铜器的初步研究	王方	(275)
对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石雕作品的几点认识	王方	(285)
成都地区战国考古学遗存初步研究	李明斌	(300)
成都市商业街船棺墓葬初析	颜劲松	(315)
巴蜀柳叶形剑研究	江章华	(326)
战国时期古蜀社会的变迁——从墓葬分析入手	江章华	(335)

## 下 册

试论四川地区战国墓中的青铜工具	黄晓枫	(347)
四川雅安沙溪遗址陶器及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	李明斌	(359)
渝东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	江章华	(368)
试论鄂西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兼谈早期巴文化	江章华	(395)
对盐源盆地青铜文化的几点认识	江章华	(404)
成都市郫县外南战国秦汉墓地分析	颜劲松	(418)
西南夷地区 A 型曲柄短剑的功能、使用方式及命名	苏 奎	(428)
滇东与黔西早期青铜时代的居民	周志清	(435)
滇东黔西地区青铜时代族群刍议	周志清	(449)
浅析云南元江流域的青铜文化	周志清	(462)
浅析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葬	周志清	(477)
破镜考	索德浩	(483)
邛崃文管所藏“三段式神仙镜”的图像研究	苏 奎	(494)
关于北周文王碑的几个问题	荣远大	(503)
成都唐代爨守忠墓志考释	荣远大	(511)
四川地区唐代砖室墓分期研究初论	刘雨茂 朱章义	(515)
青羊宫窑初探	刘雨茂	(528)
论成都唐宋罗城 1、2 号门址	蒋 成	(536)
唐宋时期四川馒头窑及其装烧技术的探讨	颜劲松	(542)
成都地区宋代墓葬出土陶俑服饰研究	颜劲松	(555)
试论四川宋墓	陈云洪	(571)
四川地区宋代金银器研究	谢 涛	(584)
成都考古发现北宋诗人宋京家族墓	荣远大 刘雨茂	(604)
成都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研究	雷玉华	(621)
四川摩崖石刻中的阿弥陀佛与五十二菩萨	雷玉华	(649)
四川菩提瑞像研究	雷玉华 王剑平	(655)
阿育王像的初步考察	王剑平 雷玉华	(668)
略论成都周边宋墓中的龙形俑	易 立	(676)
水井街酒坊遗址的发现与探索	陈 剑	(680)
关于细石器技法起源的一点看法——以楔形石核的时空分布为中心	何锟宇	(704)
浅论中国家马的起源	何锟宇	(714)

# 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

江章华 王毅 张擎

成都平原是四川盆地西部的冲积、洪积平原，其东南有连绵起伏的龙泉山脉，西北为高耸入云的龙门山、邛崃山脉，其东北和西南均为山地丘陵，整个平原呈东北—西南向的狭长形，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400~750米，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这里气候温暖湿润，适于人类的生存繁衍，因此很早就有人类在此活动，留下了许多动人而古老的历史传说。从考古学的角度建立该区域文化的发展序列，并进而结合文献建构古蜀历史是必要的。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在成都平原一系列考古新发现使得这一研究成为可能。本文试图对这一区域先秦时期的古文化遗址进行梳理，旨在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并希望对推动这一区域考古工作的开展有所裨益。

## 一、典型遗址的分析与文化阶段的划分

在成都平原发现的先秦古遗址中，广汉三星堆遗址<sup>[1]</sup>最为重要，它不仅发现最早，面积大，资料丰富，更重要的是该遗址发现了早、中、晚连续发展的三种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地层关系。最下层文化的突出特征是以泥质灰白陶为主，占65%以上；纹饰发达，占42%~45%，有绳纹、弦纹、划纹（平行线纹和水波纹）、戳印纹，还有附加堆纹、镂孔、几何形纹等；器形有镂孔圈足豆、宽沿平底尊、喇叭口高领罐、绳纹花边罐等，属该遗址分期中的第一期。紧接其上的中层文化是三星堆遗址的主体文化，也是该遗址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与下层文化区别较大。泥质陶骤然减少，以大量的夹砂褐陶为主，器形以盃、高柄豆、小平底罐、圈足盘、鬲形器、壶、觚、鸟头把勺、瓶、器盖等构成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器物群。上层文化又发生了大的变化，出现大量的尖底器，有尖底杯和尖底盏等。上述三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关系在三星堆遗址中有明确的层位证据，并且应分别命名。中层的主体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下层文化曾因其与绵阳边堆山文化面貌接近而命名为“边堆山文化”<sup>[2]</sup>，对该区域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边堆山遗址不够典型，发表的仅是调查资料<sup>[3]</sup>，以它命名不够科学。1995、1996年，在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了新津宝墩<sup>[4]</sup>、都江堰芒城<sup>[5]</sup>、郫县古城<sup>[6]</sup>和温江鱼凫村遗址<sup>[7]</sup>，这些遗址的文化面貌均与三星堆遗址下层文化接近，属同一考古学文化遗存，因此我们以典型遗址——宝墩遗址把这一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以尖底器为代表的上层

文化的典型遗址首推成都十二桥遗址<sup>[8]</sup>。该遗址文化内涵丰富，陶质以夹砂陶为主，器形为尖底杯、尖底盏、尖底罐和承袭三星堆文化的一些因素，如高柄豆、小平底罐、盃、鸟头把勺等，与三星堆文化紧密衔接，其后的发展也比较清楚，我们可以将这一文化命名为“十二桥文化”。紧接十二桥文化之后的则是该区域战国时期遗存，这一阶段发掘的遗址不多，目前只有上汪家拐遗址下层<sup>[9]</sup>和青羊宫遗址<sup>[10]</sup>，此外多为墓葬材料，我们暂时将这一阶段的文化称为“上汪家拐遗存”。参考<sup>14</sup>C 测年数据，宝墩文化上限可早到距今 4500 年，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是成都平原目前能追溯的最早古文化。这样我们可以将成都平原从相当于中原龙山时期到战国末期的先秦文化划分成为接续发展的四大文化阶段，即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上汪家拐遗存。

## 二、各阶段文化分期与特征

### （一）宝墩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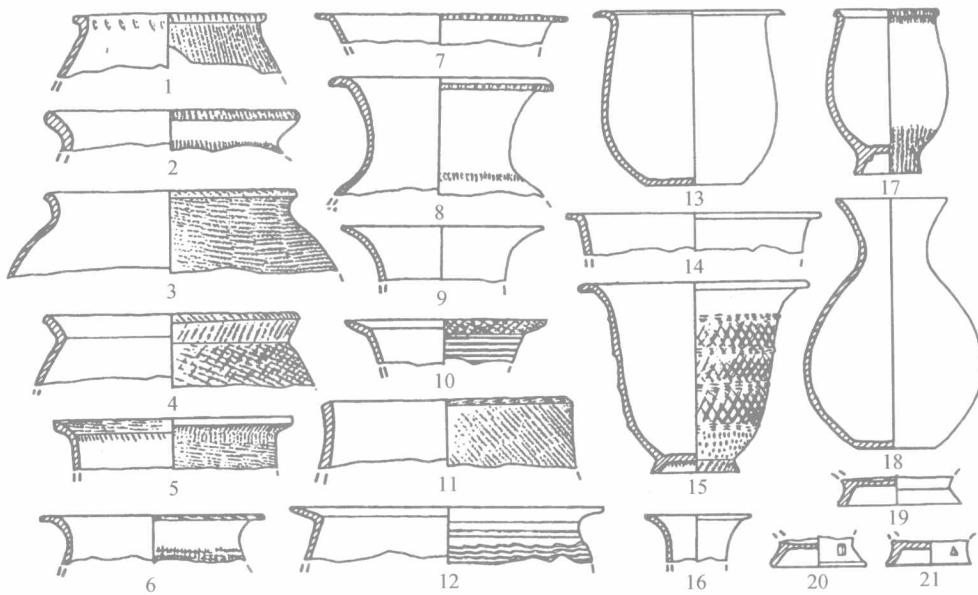
宝墩文化遗存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掘广汉月亮湾时已有发现，但资料至 1992 年才发表<sup>[11]</sup>。1980、1981 年四川省文管会等单位发掘三星堆遗址时也注意到了当时发掘的第 8、6 层文化内涵与上层区别较大，将其划归该遗址分期中的第一期。由于当时遗物太少，对其面貌认识不够清楚，在文化定性时也未能将其明确划分出来，统归入三星堆文化。绵阳边堆山遗址也发现了类似的古文化遗存，但能见到的材料仅是 198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队的一个调查简报。囿于材料，学界对这一阶段的文化始终没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概念。1995、1996 年，成都平原相继发现宝墩、芒城、古城和鱼凫村遗址，面积较大，并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掘，文化整体面貌与三星堆下层和边堆山比较一致，从而使我们对成都平原这一阶段的文化特征和发展脉络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这一文化的分布应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其影响也波及平原周邻的一些地区。这一时期的人们过着农业定居生活，兼有采集渔猎，发现的小型建筑为木骨泥墙的地面方形房屋，墙体经火烘烤。并已修建夯筑城垣，城垣平面多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仅鱼凫村古城为不规则多边形。城垣的构筑方法基本为堆筑，平地起建，呈斜坡堆积形式，夯筑的方法为拍打。发现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以斧、锛、凿为主，少量刀、铲、簇和矛，均通体磨制，形体偏于小型化。斧为上窄下宽的长条形，弧顶，弧刃；锛比斧小，磨制精细，形体单一，弧顶，直刃，刃部明显宽于顶部；凿磨制精细而规整，石质较佳，有似玉者，形体有扁平长条形、圭形、刃口内凹的窄长条形以及一端为圭形一端为直刃的双端刃形；铲和刀均穿孔，但发现很少且残；刀为横长方形，上下均有刃；石簇为扁平菱形。总的来说，石工具多于手工工具。陶制生产工具有纺轮和网坠。陶器制作以手制加慢轮修整为主，圈足和器底均为二次黏接，夹砂陶器的器底多为外接，形成器壁近底处外折似假圈足。陶质分夹砂和泥质两种，夹砂陶多羼白色石英砂，有粗细之分，以细者居多，陶色分灰、

褐和外褐内灰；泥质陶分灰白、灰黄、褐、灰等，还有一定数量的黑衣陶。夹砂陶的装饰以绳纹为主，泥质陶以戳印纹、附加堆纹、划纹和弦纹为主。划纹中多水波纹和平行线纹，也有平行线组合成的几何形纹，水波纹多见于领部，平行线纹多见于腹部；戳印纹多为坑点或长条痕，多见于肩、腹部；附加泥条戳印纹多见于腹部。器型多宽沿、大翻口风格，主要是小平底器和圈足器，不见三足器和圜底器。绳纹花边罐、敞口圈足尊、盘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壶、宽沿平底尊、宽沿盆等是贯穿这一文化始终的代表性器物群。少量深腹罐、曲沿罐、矮领圆肩罐、窄沿盆、敛口瓮、窄沿罐、钵、浅盘豆、筒形器等分别出现在该文化的不同阶段。

对该文化的分期只能以宝墩、芒城、郫县古城和鱼凫村遗址 1996 年的发掘材料为依据，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几个遗址文化面貌由于时代早晚不同而造成不同程度的差异。宝墩遗址属一个时期，鱼凫村和郫县古城的文化面貌接近，芒城的文化面貌正好介于二者之间。关于这几个遗址年代的早晚关系没有明确的层位依据，只有依靠文化的发展趋势加以推定。关于这个问题已有专文讨论<sup>[12]</sup>，由此可确立宝墩—芒城—郫县古城、鱼凫村遗址的早晚关系。其中宝墩可作为该文化的第一期，依据其上下层的变化，可分早、晚两段。芒城的文化面貌单纯，无法再分段，可作为该文化的第二期。鱼凫村遗址可分早、中、晚三段。郫县古城可分早、晚两段，其中鱼凫村早段与郫县古城早段一致，郫县古城晚段出现的曲沿罐、窄沿盆与鱼凫村晚段接近，但尚未出现鱼凫村晚段的矮领圆肩罐、敛口瓮、器盖等三星堆文化因素，故其时代应早于鱼凫村晚段而晚于鱼凫村中段。总之，鱼凫村早、中段与郫县古城整体文化面貌较为一致，可以作为该文化的第三期。鱼凫村晚段与前两段区别较大，可作为该文化的第四期。这样就将宝墩文化分成了四期七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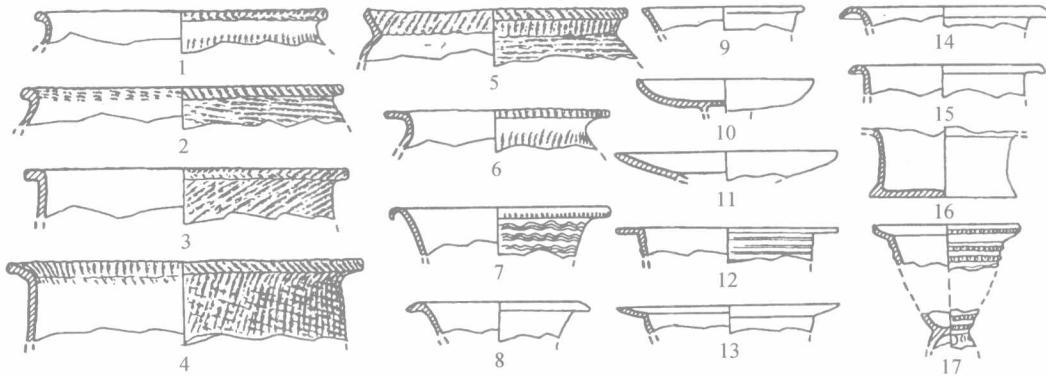
一期早段：以宝墩遗址早段为代表。泥质陶的数量多于夹砂陶，泥质陶以灰白陶为主，次为灰黄陶；夹砂陶以灰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次为戳印纹、划纹和附加泥条戳印纹等，少量凹弦纹、凸弦纹、瓦棱纹和细线纹。划纹中多水波纹和平行线纹。器物种类较多，制作较好，以绳纹花边罐、敞口圈足尊、盘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宽沿平底尊、宽沿盆、壶等为基本组合。其中绳纹花边罐数量最多，型式多样；喇叭口高领罐多唇部戳压成锯齿状者。这一时期的圈足低矮、多绳纹和戳印纹装饰；镂孔中方形镂孔多见（图一）。

一期晚段：以宝墩遗址晚段为代表。泥质陶多于夹砂陶。泥质陶中的灰黄陶明显增多，与灰白陶的数量相当。夹砂陶仍以灰陶为主。与前一阶段相比，陶器制作没有那么精细，纹饰的比例降低，种类减少，仍以绳纹为主，次为戳印纹、压划纹和附加泥条戳印纹，少量凹凸弦纹、瓦棱纹、细线纹等。圈足上的方形镂孔减少，多圆形镂孔。该段的器物类别基本沿袭前一阶段，但绳纹花边罐的口沿变窄，喇叭口高领罐的口沿多卷，锯齿喇叭口高领罐的数量减少，外叠唇的喇叭口高领罐、浅盘豆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还见个别的筒形器（图二）。



图一 宝墩文化一期早段典型陶器

1 ~ 6. 绳纹花边罐 (H15: 2、III T1929(7): 43、III T2030(7): 137、III T2030(7): 47、III T2029(7): 129、III T1929(7): 82)  
7 ~ 9. 喇叭口高领罐 (III T2030(7): 94、III T1929(7): 44、III T2029(7): 80) 10. 盘口圈足尊 (III T1929(7): 53) 11. 缸  
(III T2229(7): 19) 12. 盆 (III T2030(7): 65) 13. 宽沿平底尊 (H16: 57) 14、15. 敞口圈足尊 (III T2030(7): 118、  
III T1929(7): 128) 16、18. 壶 (III T1929(7): 46、III T1929(7): 2) 17. 圈足罐 (H16: 1) 19 ~ 21. 圈足 (H16: 55、  
III T1930(7): 151、III T2029(7): 152) (均为宝墩遗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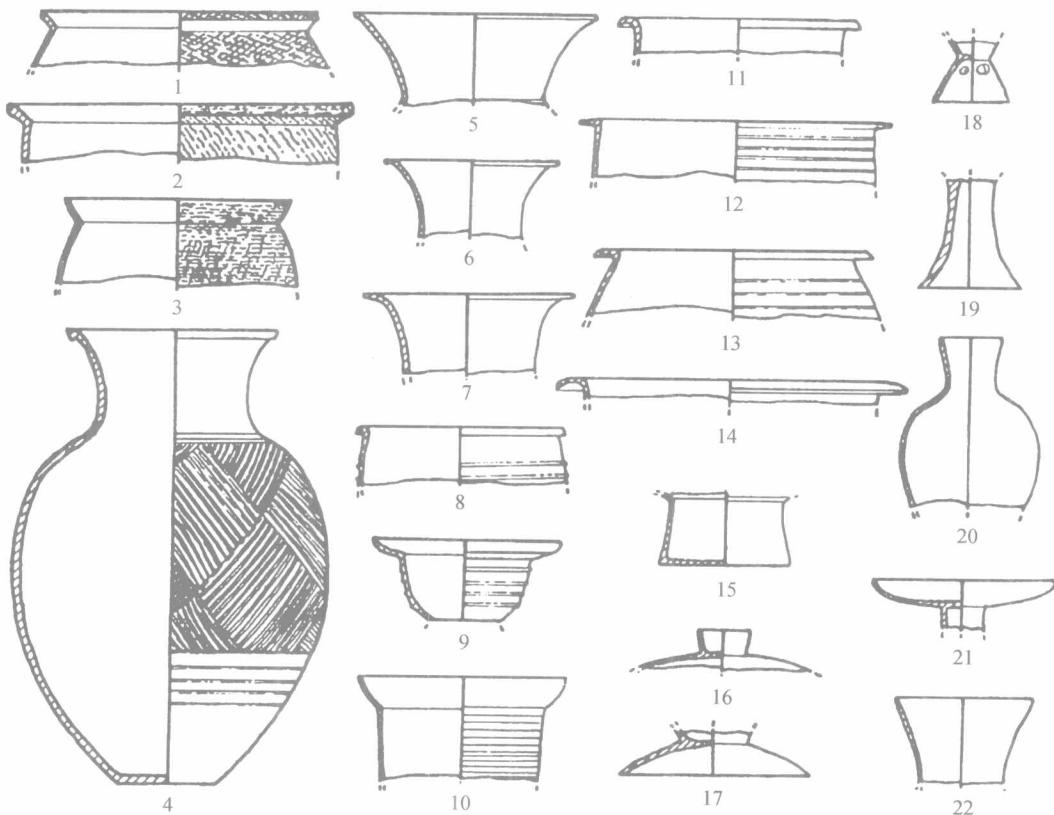


图二 宝墩文化一期晚段典型陶器

1 ~ 6. 绳纹花边罐 (III T1929(6): 29、III T2130(6): 38、III T2129(6): 31、III T2030(6): 27、III T1929(6): 35、III T1830  
(6): 59) 7 ~ 9. 喇叭口高领罐 (III T2129(5): 1、III T1830(6): 1、III T2129(6): 16) 10、11. 浅盘豆 (III T1830(6): 40、  
III T2130(6): 25) 12、13. 盆 (III T1930(6): 6、III T2129(6): 15) 14. 敞口圈足尊 (III T1930(6): 62) 15. 宽沿平  
底尊 (III T2129(6): 14) 16. 筒形器 (III T1830(6): 42) 17. 盘口圈足尊 (III T1830(6): 115) (均为宝墩遗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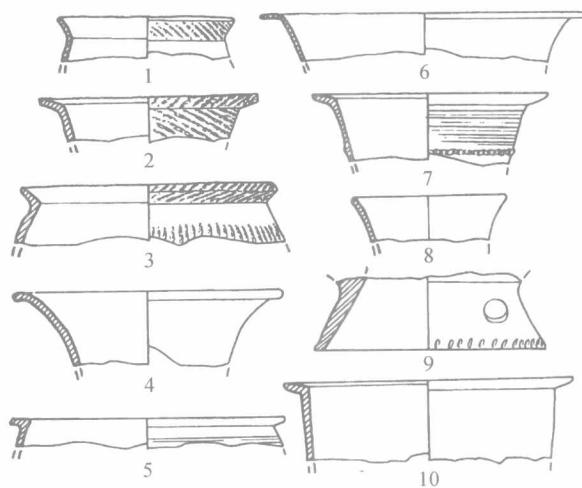
二期：以芒城遗址为代表。泥质陶的数量下降，但仍多于夹砂陶。陶器的火候降低，陶质变软。灰黄陶成为泥质陶的主要陶系，灰白陶的数量大大减少，退居次要地位；夹砂陶分灰、褐和外褐内灰三种，所占比例接近。纹饰已远不如一期发达，仍以绳纹为主，次为划纹和戳印纹，少量的附加堆纹、凹凸弦纹等。划纹中多平行线纹或平行线组合成的几何形纹，极少见水波纹。器物种类明显减少，比较明显的变化是绳纹花边罐型式单一，主要是斜侈沿型；喇叭口高领罐主要是外叠唇型，锯齿口型极少见；盘口圈足尊器身变矮，圈足加高；出现细高领壶；浅盘带柄豆和盆增多。其他还见少量的卷沿罐、筒形器和器盖等（图三）。

三期早段：以鱼凫村早段和郫县古城早段为代表。泥质陶进一步减少，夹砂陶明显增多，两者比例相当。夹砂陶以外褐内灰陶和褐陶为主，夹砂灰陶的数量大大减少；泥质陶中灰白陶的数量剧减，以泥质褐陶和黑衣陶为主。纹饰不发达，泥质陶多素面，夹砂陶多绳纹；此外还见有少量的附加泥条戳印纹、划纹、凹凸弦纹、戳印纹，圈足上多



图三 宝墩文化二期典型陶器

- 1~3. 绳纹花边罐 (H1:41、T6④:22、H7:4) 4~7. 喇叭口高领罐 (G4:265、H8:5、G4:179、G4:65) 8. 卷沿罐 (T5④:25) 9、10. 盘口圈足尊 (H4:9、G4:156) 11. 宽沿平底尊 (T1⑤:13) 12~14. 盆 (G4:50、G4:165、G4:117) 15. 筒形器 (G4:176) 16、17. 器盖 (G4:201、T3③:75) 18. 圈足 (H5:5) 19、21. 浅盘豆 (G4:213、H4:1) 20、22. 壶 (T7④:41、T8⑤:46) (均为芒城遗址出土)



图四 宝墩文化三期早段典型陶器

1~3. 绳纹花边罐 (H18①: 15、T3⑪: 78、H9: 6) 4. 喇叭口罐 (H71: 73)  
5. 折沿罐 (T3⑪: 85) 6、7. 敞口圈足尊 (H28①: 29、H9: 45)  
8. 壶 (H9: 69) 9. 圈足 (H18②: 44)  
10. 宽沿平底尊 (H9: 33) (1、4、6、9. 鱼凫村遗址出土,  
余为郫县古城遗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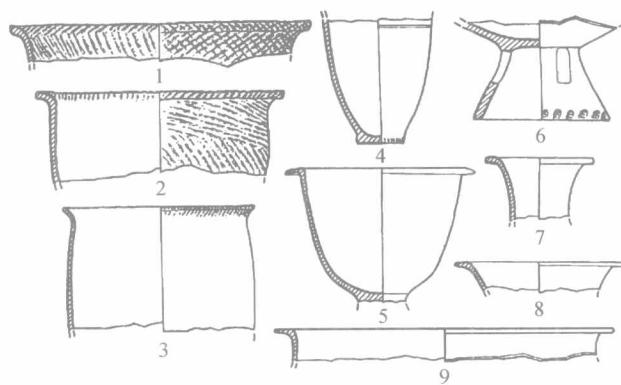
喇叭口高领罐的数量极少。敞口圈足尊器身变矮胖，圈足变高直，镂孔增大。新出现深腹罐，其中的小平底似假圈足，底部饰旋转绳纹很有特色（图五）。

三期晚段：以郫县古城晚段为代表。夹砂陶的数量大增，占据了主导地位。夹砂陶中的褐陶剧增，外褐内灰陶剧减，少量的黑陶。泥质陶以灰陶为主，次为褐陶，少量黑衣陶。泥质陶仍以素面为主，夹砂陶以绳纹为主；此外还见有平行线、弧线、交叉、网状等划纹，偶见水波划纹；戳印纹有新月形纹、三角形坑点纹等；其他有少量附加堆纹和凹凸弦纹。绳纹花边罐已很少见。新出现曲沿罐、窄沿罐、钵等；敞口圈足尊、宽沿平底尊和喇叭口高领罐仍然存在。敞口圈足尊的器身变矮，腹壁斜直，圈足增高（图六）。

四期：以鱼凫村晚段为代表。这一时期与前几期相比有较大的变化，陶质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陶中有灰陶、褐陶和黑衣陶。泥质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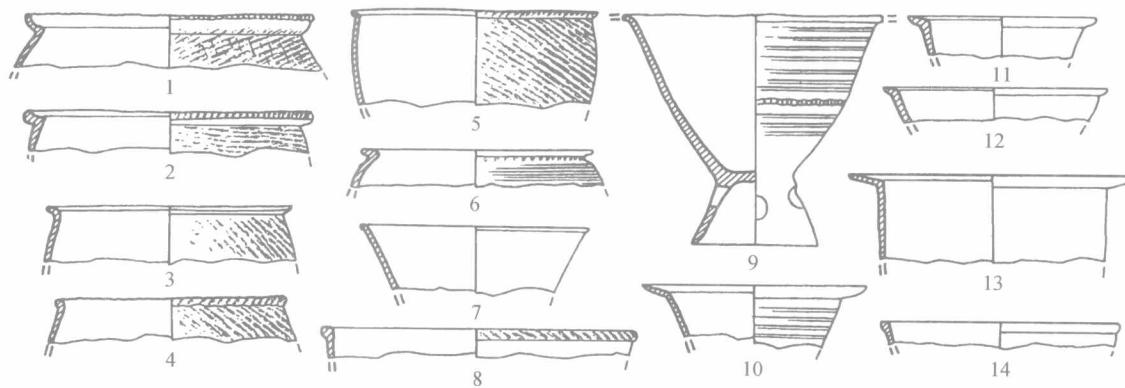
镂孔装饰。这一时期的绳纹花边罐主要是沿袭二期的斜侈沿型，喇叭口高领罐主要是外叠唇型，敞口圈足尊、宽沿平底尊仍然存在，壶、盘口圈足尊和浅盘豆少见。新出现口沿根部较厚的折沿罐（图四）。

三期中段：以鱼凫村中段为代表。陶系仍以夹砂外褐内灰和褐陶为主，其次是泥质灰陶和黑衣陶，少量泥质褐陶。泥质陶仍然多素面，夹砂陶多绳纹；此外见有附加泥条压印纹、戳印纹、划纹、瓦棱纹、凹凸弦纹等。划纹主要是平行线纹；戳印纹有新月形、圆圈纹等。这一时期的绳纹花边罐多见外折厚方唇型，斜侈沿型开始消失；敞口圈足尊、宽沿平底尊、喇叭口高领罐、壶等仍然存在，但壶和



图五 宝墩文化三期中段典型陶器

1、2. 绳纹花边罐 (T5⑤: 174、H15②: 111) 3、4. 深腹罐 (H15②: 86、H15②: 85) 5. 敞口圈足尊 (H15②: 34) 6. 圈足 (H15②: 47)  
7. 壶 (H15②: 129) 8、9. 宽沿平底尊 (T9⑥: 27、H15①: 160) (均为鱼凫村遗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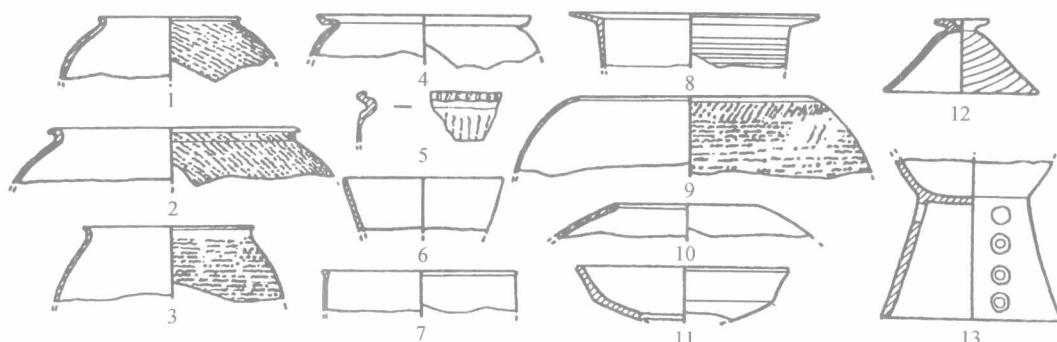
图六 宝墩文化三期晚段典型陶器

1、2. 曲沿罐 (H10: 10、T5⑬: 94) 3~5. 窄沿罐 (T5⑫: 41、T2⑧a: 19、T4⑪: 87) 6. 敞口罐 (T5⑬: 129) 7. 喇叭口高领罐 (T4⑫: 97) 8、14. 窄沿盆 (T5⑫: 15、T2⑨: 49) 9、10. 敞口圈足尊 (H10: 1、T5⑬: 102) 11、12. 钵 (T3⑨: 29、T4⑬: 164) 13. 宽沿平底尊 (T4⑬: 143) (均为郫县古城遗址出土)

仍多素面，夹砂陶以绳纹为主；少量的戳印纹、划纹、凹凸弦纹等。绳纹花边罐、壶和喇叭口高领罐极少见，沿袭了三期晚段的曲沿罐、窄沿盆。新出现敞口瓮、矮领圆肩罐、折腹钵、器盖等，圈足更高直（图七）。

关于该文化的年代上限有以下几个<sup>14</sup>C 测定数据可以参考：①宝墩遗址北城垣真武观段城墙内的炭标本测定年代为距今 4405 年 ± 95 年<sup>[13]</sup>，与炭标本共存的遗物为一期早段；②1980 年发掘的三星堆Ⅲ区第 6、8 层的炭标本，这两层的文化内涵前面已述及与宝墩文化一期的一致，测定年代为距今 4500 年 ± 150 年<sup>[14]</sup>；③1986 年发掘的三星堆Ⅲ区 T1416 的炭标本测定年代为距今 4665 ~ 4615 年 ± 135 年<sup>[15]</sup>。

依据以上<sup>14</sup>C 测定数据，我们可以将该文化的年代上限推定在距今 4500 年左右。关



图七 宝墩文化四期典型陶器

1~3. 矮领圆肩罐 (H73②: 150、H73②: 151、H73④: 172) 4、5. 曲沿罐 (T9⑤: 83、H73①: 29) 6. 壶 (H73④: 198) 7. 窄沿盆 (H73③: 125) 8. 宽沿盆 (T5④: 88) 9、10. 敞口瓮 (H73④: 150、H73④: 193) 11. 钵 (T9⑤: 78) 12. 器盖 (H73④: 190) 13. 圈足 (T5④: 22) (均为鱼凫村遗址出土)

于其年代下限，根据该文化末期正好与三星堆文化衔接的情况分析，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上限正好是宝墩文化的下限，而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上限有众多的<sup>14</sup>C年代数据，一般认为在距今3700年左右，可以作为宝墩文化的下限。这样，宝墩文化的年代范围可以大致推定在距今4500~3700年之间，前后发展800年左右。

## （二）三星堆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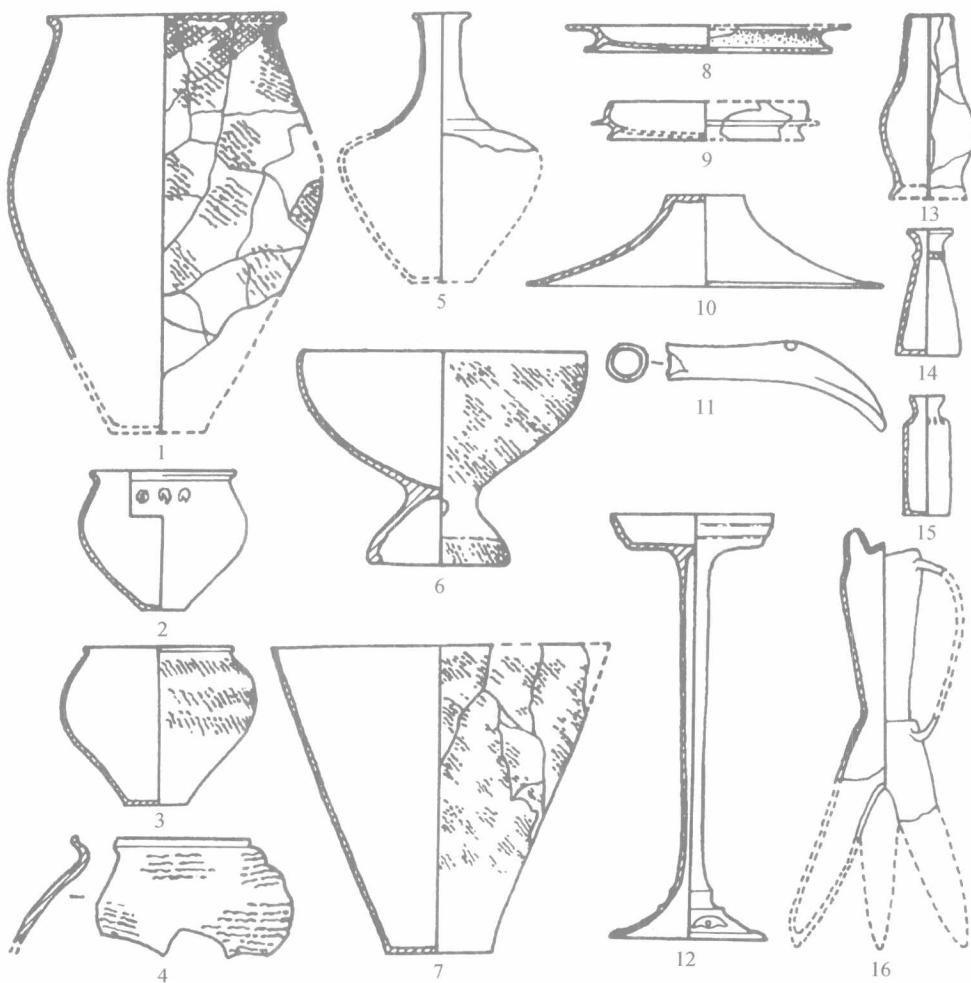
在成都平原发掘的这一阶段的古遗址主要是广汉三星堆，另外新都桂林乡遗址的上层也属于这一阶段的遗存<sup>[16]</sup>。广汉三星堆遗址从20世纪30年代首次发掘以来，至今已有60余年，前后经过多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对这一文化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一时期的房屋建筑有圆形、方形、长方形等，以长方形居多，墙基多挖基槽。槽宽17~30、深20~50厘米，在沟底掘小沟或柱洞，洞径一般为14~30、间距60~110、沟底小槽宽5~10厘米。推测于柱间立小木（竹）棍，再于坑内填土埋实，小棍上编缀竹、木条等物，然后两面涂抹草拌泥而成“木骨泥墙”，并经火烘烤。发现的生产工具多为通体磨制的小型石器，有平面呈梯形的石斧、锛、长条形的石凿、半月形的弧背石刀等，以及少量的杵、锥、矛，还见石纺轮。石质多系片岩、页岩和板岩。石纺轮通常利用石璧钻下的石心再穿孔加工而成，穿孔有琢钻和管钻两种方法。陶质生产工具有纺轮和网坠。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比例达80%以上。夹砂褐陶是最主要的陶系，次为夹砂橙黄陶和夹砂灰陶；泥质陶较少，有灰陶、褐陶和橙黄陶。纹饰不发达，常见的有绳纹、弦纹、压印纹、附加堆纹、划纹、几何形纹、方格纹、戳印纹、圆圈纹、“F”形纹、人字纹等，器物圈足上见镂孔装饰。主要器物类别有小平底罐、高柄豆、盃、鸟头把勺、壶、瓶、觚、圈足盘、鬲形器、器盖等。三星堆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三星堆遗址不断发现玉石礼器，尤其是两个埋藏坑的发现<sup>[17]</sup>，出土大量的铜、金、玉、石等质料的礼器、神器等，以及规模巨大的城垣，都显示出这一时期已进入文明社会，并且三星堆遗址就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对三星堆文化进行分期，目前主要有三批材料，一是1963年发掘的月亮湾，二是1980、1981年发掘的三星堆Ⅲ区，三是1986年发掘的三星堆I~Ⅲ区材料。前两批材料有简报发表，第三批材料见于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一文<sup>[18]</sup>。有代表性的地层单位有1980、1981年Ⅲ区的第2层→第3层→第4层；1996年的第8A层→第8B层→第8C层→第9层→第10层→第11层→第12层（箭头代表叠压或打破）。依据这些地层单位文化面貌的同一与变异程度可将该文化分成三期。

一期：以1986年发掘的第12、11层和1980年Ⅲ区的第4、3层为代表。这一时期以夹砂陶为主，约占70%，泥质陶仅占30%左右。夹砂陶中以褐陶为主，次为橙黄陶；泥质陶中主要是灰陶和橙黄陶。纹饰不发达，仅占17%左右，以绳纹为主，次为划纹、弦

纹、网纹、篦纹等。主要器形有小平底罐、敞口深腹平底器、绳纹花边深腹罐、高柄豆、细颈壶、瓶、盃、鬲形器、鸟头把勺、圈足盘、器盖等。这一时期的小平底罐多为圆肩深腹，肩径明显大于口径，与宝墩文化四期的矮领圆肩罐一脉相承；高柄豆的豆柄多为柱形；瓶有圈足瓶和平底瓶，圈足瓶为直口，口径小于颈径，平底瓶的腹为直腹；陶壶较少，仅有细长颈壶；盃的器身瘦高；鸟头把勺的鸟喙部长而简单；器盖中有平顶无钮和有圈钮两种，以平顶无钮的最有特色（图八）。

二期：以1986年发掘的第9层、1980年Ⅲ区的第2层和月亮湾第2层为代表。该期泥质陶的比例下降，夹砂陶增多，达80%以上。仍以夹砂褐陶为主，次为橙黄陶；泥质陶中的橙黄陶很少见。素面陶增多，纹饰仅占8%左右。这一时期的器形除沿袭一期的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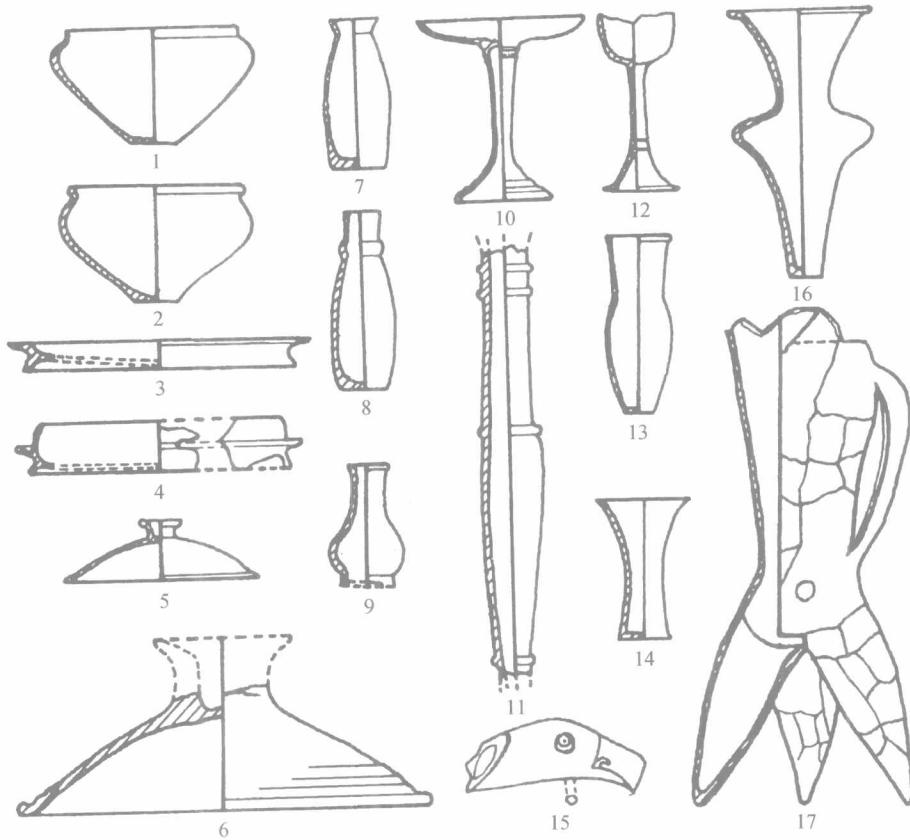
图八 三星堆文化一期典型陶器

1. 深腹罐 (80 III CaT1③: 55)
- 2 ~ 4. 小平底罐 (80 III AaT4③: 63、80 III DaT2④: 15、80 III DaT2④: 4)
5. 细颈壶 (80 III DaT2④: 56)
6. 豆 (80 III DaT2③: 34)
7. 敞口深腹器 (80 III DaT2④: 44)
- 8、9. 圈足盘 (80 III DcT1③: 2、80 III DaT2③: 3)
10. 器盖 (80 III DaT1③: 8)
11. 鸟头把勺 (86 III T1617⑫: 6)
12. 高柄豆 (80 III BaT1③: 36)
- 13 ~ 15. 瓶 (80 III DaT2④: 50、86 III T1517⑫: 46、86 III T1617⑫: 92)
16. 盃 (80 III DaT1③: 42) (均为三星堆遗址出土)

平底罐、高柄豆、瓶、盂、鬲形器、鸟头把勺、圈足盘外，新出现有喇叭口高领、凸肩小平底壶、长颈壶、圈足带耳长颈壶、觚等，不见一期的敞口平底器、绳纹花边罐、平顶无钮器盖等。一些器物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如小平底罐的腹部开始变浅，圈足瓶的口变侈、颈微束、口径大于肩径，平底瓶已从一期的直腹变为弧腹，鸟头把勺的喙部变短而制作更细致，出现竹节状豆柄（图九）。

三期：以1986年发掘的第8A、8B、8C层为代表。夹砂陶继续增多，泥质陶进一步减少。夹砂褐陶仍然是最主要的陶系，并有增多的趋势。纹饰很少，以绳纹为主。该期基本延续二期的器物群，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从器物形态看，这一时期的小平底罐的腹部更浅，肩变为圆折，肩径与口径接近；盂器身变矮胖；觚的口变大，并出现器身近底处外鼓的新器形，个别出现鑿；器盖多小圈纽，盖腹变浅；豆柄多样，尤其是竹节状豆柄发达；壶的颈有变高直的趋势；鸟头把勺的柄部装饰精细而繁缛（图一〇）。

关于三星堆文化的年代，前面我们已述及三星堆文化的上限与宝墩文化衔接，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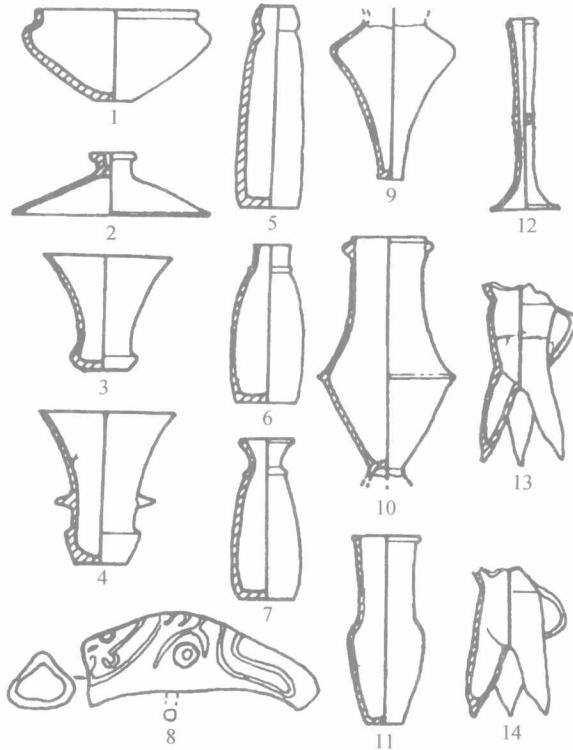
图九 三星堆文化二期典型陶器

- 1、2. 小平底罐 (86ⅢT1516⑨:61、86ⅢT1415⑨:104) 3、4. 圈足盘 (80ⅢDaT1②:11、80ⅢDeT1②:4) 5、6. 器盖 (86ⅢT1517⑨:77、80ⅢDaT1②:40) 7~9. 瓶 (86ⅢT1416⑨:81、86ⅢT1516⑨:111、86ⅢT1313⑨:16) 10~12. 高柄豆 (86ⅢT1517⑨:22、80BaT1②:36、86ⅢT1414⑨:22) 13、16. 壶 (86ⅢT1515⑨:43、86ⅢT1414⑨:4) 14. 觚 (86ⅢT1415⑨:138) 15. 鸟头把勺 (86ⅢT1515⑨:159) 17. 盂 (80ⅢCbT6②:41) (均为三星堆遗址出土)

<sup>14</sup>C 测年数据推定在距今 3700 年左右，即上限跨到二里头文化的四期。一些器物的类比也可证明其大致不误，如三星堆文化中的盃、觚明显是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长江中游辗转传入成都平原的。二里头文化的南侵，在长江中游的鄂西地区表现非常突出，如湖北荆南寺遗址的夏至早商遗存<sup>[19]</sup>、宜昌中堡岛遗址的夏商文化遗存<sup>[20]</sup>、秭归朝天嘴遗址的夏商文化遗存<sup>[21]</sup>等出土大量的二里头文化遗物，有深腹盆、三角形扁足鼎、圆腹罐、大口尊、鬻、刻槽盆、盃等。与之共存的还有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把勺、器盖等三星堆文化常见器物。三星堆文化一期的高柄豆圈足上所见的“臣”字纹在荆南寺的一件罍上就有，而这种“臣”字纹最早见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一件小口尊的肩部，这不可能是巧合，应是文化间的传播所致，它反映出这一时期三地间的文化交流是非常频繁的，这为我们推定三星堆文化的年代提供了依据。荆南寺遗址中出有与三星堆文化类似的高柄豆、器盖，年代在二里冈上层偏早阶段，其高柄豆为竹节状柄，是三星堆文化二期的特征，因此，三星堆文化一期应早于二里冈上层。中堡岛遗址的上层与高柄豆、鸟头把勺共存的二里头文化遗物有敞口圆腹罐、长袋形盉足、“S”形纹等可早至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根据<sup>14</sup>C 测年结合器物类比，将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上限推定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比较合适。至于三星堆文化的下限，由于其陶器地方性特征很强，无法与其他地区已知年代的器物进行类比，不过十二桥文化是紧接三星堆文化发展而来的，而十二桥文化的上限能确定在殷墟三期左右（下面在十二桥文化中将有详论），那么三星堆文化的年代可大致推定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至殷墟二期。

### （三）十二桥文化

属这一阶段的遗址经发掘的有成都市十二桥、指挥街<sup>[22]</sup>、方池街<sup>[23]</sup>、岷山饭店<sup>[24]</sup>、



图一〇 三星堆文化三期典型陶器

1. 小平底罐 (86 III T1416 ⑧b: 19)
2. 器盖 (86 III T1313 ⑧c: 9)
- 3、4. 觚 (86 III T1414 ⑧b: 69、86 III T1415 ⑧a: 34)
- 5 ~ 7. 瓶 (86 III T1415 ⑧a: 33、86 III T1515 ⑧b: 44、86 III T1516 ⑧a: 138)
8. 鸟头把勺 (86 III T1517 ⑧a: 139)
- 9 ~ 11. 壶 (86 III T1517 ⑧b: 100、86 III T1516 ⑧b: 126、86 III T1415 ⑧a: 157)
12. 高柄豆 (86 III T1415 ⑧a: 105)
- 13、14. 盂 (86 III T1414 ⑧b: 55、86 III T1516 ⑧b: 102) (均为三星堆遗址出土)

抚琴小区<sup>[25]</sup>、羊子山土台下堆积<sup>[26]</sup>、新繁水观音<sup>[27]</sup>等，资料正式发表的有十二桥、指挥街、新繁水观音和羊子山土台下堆积等，其中以十二桥遗址最典型，延续时间最长，公布的材料最多。这一时期的房屋建筑仅有十二桥的木构建筑，小型房屋为打密集木桩，桩上绑扎圆木呈网状，其上铺木板作为居住面，使居住面相对抬高，避免了潮湿。这种房屋的墙体仍为柱间编竹形成竹编墙，内外抹泥，屋顶盖草。墙体和屋顶都发现有完整者，故其做法非常清楚。除小型房屋外还发现有大型的地梁基础，地梁上有立柱的圆形和方形卯孔，可能是大型带廊庑的宫殿式建筑。石质生产工具仍然以通体磨制的小型斧、锛、凿为主。斧和锛平面均呈梯形，凿有圭形和扁平长条形，还有少量的璜等装饰品。另外存在大量的不知用途的石盘状器。骨器很多，有笄、针、锥、镞等，均磨制，以笄、针、镞磨制最为精细，骨器中还发现有大量的有使用痕迹的鹿角器。铜器发现有细长条形的凿和有方锥状的铤，带脊、两翼倒刺的镞以及最原始的柳叶形剑。卜甲的多见是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的特征，明显是受中原商周文化的影响，一般多龟腹甲，有圆钻无凿和圆钻方凿并存的两种。陶制生产工具中纺轮数量较多，网坠较少。这一时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极少。夹砂陶中分褐、灰和褐皮灰心陶；泥质陶中以灰陶为主，少量褐陶。素面陶占绝大多数，纹饰少见，主要以绳纹为主，少量的重菱纹、鸟纹、弦纹、附加堆纹和圆圈纹等，镂孔见于圈足上。器物类别有高柄豆、小平底罐、盃、鸟头把勺、尖底杯、尖底罐、尖底盃、壶、瓶、盆、高领罐、波浪花边口罐、盆形豆、罐形豆、瓮、敛口罐、喇叭口罐、釜、绳纹罐、钮呈“8”字形和三花瓣形的器盖等。

对十二桥文化进行分期的主要依据是十二桥遗址和新繁水观音遗址。十二桥遗址1985、1986年经过两次发掘（I、II区），加之1995年发掘的新一村，前后共发掘了三次。新一村出土的遗物明显晚于一、二区。且其间的文化面貌区别较大，笔者曾就此而将之划分为上、下层文化加以区分<sup>[28]</sup>，在此作为十二桥文化的两期处理，但其间的巨大变化是不容忽视的。I、II区典型的地层单位是第10层→第11层→第12层→第13层，新一村是第6层→第7层→第8层；新繁水观音地层单位为晚期墓（M2、M8）→第3层→早期墓（M4、M5）；指挥街的地层明显为再生堆积，最早的地层出有战国遗物，已有人注意到了该问题<sup>[29]</sup>，不能作为分期依据。根据十二桥各地层单位文化面貌的同一与变异程度，结合新繁水观音遗址，可将该文化分成两期四段。

一期早段：以十二桥I、II区的第13、12层，新繁水观音的早期墓和第3层及羊子山土台下的堆积为代表，三星堆遗址1982年发掘的第3层也属这一时期。陶质以夹砂褐陶为主，其次是夹砂灰陶，少量的泥质灰陶和褐陶。器表大多呈灰黑色，部分陶色不一，褐黑相杂。器物多素面，只有少量的绳纹、重菱纹、鸟纹、弦纹和附加堆纹。这一时期的陶器种类丰富，有小平底罐、高柄豆、瓶、壶、鸟头把勺、盃、尖底杯、尖底盃、高领罐、波浪口花边罐、肩部饰绳纹的敛口瓮、肩部饰重菱纹的广肩罐、盆、钮呈“8”字形和三花瓣状的器盖等，尖底罐和喇叭口罐数量较少，绳纹罐和釜偶见。高柄豆分杯形、盘形和假腹三种；尖底杯多折腹，也有弧腹者；陶壶均带耳；尖底盃的形制多样，